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文獻考訂編 三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文獻考訂編

三



中華書局

G312.61

3574

“韋弦”“慎所好”二賦非劉知幾所作辨

洪業

全唐文輯錄唐劉子玄所撰文篇中載有三賦(註一)；今爲校訂標點如下：

思慎賦(並序)(註二)

賦形天地(註三)，受氣陰陽；生樂死哀，進榮退辱：此人倫之大分也。然歷觀自古，以迄於今，其有才位見稱，功名取貴：非命者衆，克全者寡。大則覆宗絕祀，湮沒無遺；小則繫獄下室，僅而獲免。速者敗不旋踵；寬者憂在子孫。至若保令名以沒齒，傳貽厥於後胤(註四)，求之歷代，得十一於千百。某嘗迹其行事，略而論之。至如望夷篡奪，鴻溝戰爭，包燕蓋之異志，踐恭顯之邪迹：或干紀亂常，或窺蔡儵倖，此而獲罪，固其宜也。爭二城而相殺，期五鼎以就烹，獻魚炙以交鉞，舞鷄鳴而伏鑕：或幸災樂禍，或甘死徇生，求而得之，又何怨也。降茲以外，有異於是；莫不重七尺於太山，倏一毛於尺璧；徒惡其死，而不知救死之有方；但惜其生，而不識衛生之有術。何者？地居流俗之境，身當名利之場：皆物之相物，我之自我；當仁不讓，思倍萬以孤標；唯利是視，顧半千而秀出。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官大於國，主必惡之。而名譽娛其耳，光榮炫其目；

(註一) 徐松等編全唐文(1000卷，1814；1901廣雅書局刻本)274.1a—6a。劉子玄、全唐文改作劉子元，蓋避清聖祖(1662—1722)之諱(玄樞)。案劉子玄(661—721)原名知幾，字子玄。後來要避唐玄宗(712—756；710年中立爲皇太子)名字(隆基)之音，乃改名爲子玄。舊唐書(200卷，945；1894上海同文書局影印股本)102.6a—12b以劉子玄標題傳目；其傳內則於景雲(元年起七月己巳，19.vii,710)以前，稱知幾，其後，稱子玄。名從主人，文合史實；筆法可依。唐書(225卷，1060；1894上海同文書局影印股本)132.1a—4a則前後統稱子玄。

(註二) 題下小注“並序”二字，我改置括弧中。案三賦之文並見李中等編苑英華(1000卷，987編成；1204校訂；1567福建刻本)92.1a—8a及陳元龍編歷代賦彙(140卷，II外集20卷，III逸句2卷，IV補遺22卷，V目錄4卷，1706；1888上海雙印書局石印本)中之三卷(69.3b—4b“思慎賦”，67.7a“韋弦賦”，68.3a“慎所好賦”)。英華於題下無小注，而於序前有“序”字。賦彙於題下作“有序”二小字。

(註三) 英華於此句下有注云：“一作‘且夫肖形天地’”。

(註四) 賦彙作“胤”，全唐文作“允”，皆因避清世宗(1723—1735)之諱(胤禛)而改。

口甘腴餒，嚙鉤吻之腐腸；身安棟宇，誠垂堂之折足。自謂長無六疾，永固百齡，巋然可與金石齊堅，松喬比壽者矣。殊不知關張以傲誕爲將，桑霍以滿盈居職，晁錯削國以獻忠，伯宗匡朝而好直，處父則純剛立性，張溫則太明爲識：見之者爲之寒心，聞之者爲之變色。亦猶臥於積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將然；巢於折荇之末，而不悟風之已至。旣而惡稔釁盈，道窮數極；黃沙在縶，懷上蔡而無追；白刃臨頸，揮廣陵而長歎。猶以爲禍出不虞，災非素漸。以茲自卜，奚其謬歟！假有舉一反三，蠲分菽麥；知豐屋之不誠，悟覆車之足尤；而皆宴安鴆毒，遲疑猶豫。交戰未勝而禍機先發。不杜之於欲萌，方悔之於旣兆。用使茂先將戮，顧諟子而多慙；安仁已收，負慈親而永訣。嗚呼！自古所以多殺身亡族者，職由於此也。因斯而言，則知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自貽伊戚，匪降於天；而謂之不幸，未之聞也。昔夫子有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竊以仁爲百行之首，大聖共猶病諸。然以中才之人企勉而行，猶或可及；況其慎者。蓋不過慎言語，節飲食，知止足，避嫌疑；若斯而已矣。非有朝聞夕死，去食存信之難也。違之則爲凶人，蹈之則成吉士；其爲弘(註一)益多矣。而世人罕能修身(註二)厲已，自求多福；方更越禮過度，坐致覆亡。此宣尼所以譏鮑莊子之智(註三)不如葵，而孫叔敖譬以螳螂伺蟬，不知黃雀在後。余早遊墳素，晚仕流俗；觀古今之人物極矣，見吉凶之成敗衆矣。夫貴不如賤，動不如靜；嘗聞其語，而未信其事；及身更之，方覺斯言之徵矣。加以守愚養拙，怯進勇退；每思才輕任重之誠，智小謀大之憂；觀止足於居常，絕覬覦於不次，是以度身而衣，量腹而食；進受代耕之祿，退居負郭之田。庶幾全父母之髮膚，保先人之丘(註四)墓。一生之願，於斯(註五)足矣。但才非上智，習以性成；猶恐覩芳餌而貪生，處鮑肆而神化。苟或(註六)靜退之心日弛，則馳競之慾日增；顛沛以之，嗟何及矣！常思列銘几杖，

(註一) 全唐文作“宏”蓋避清高宗(1736—1795)之諱(弘曆)。賦彙仍作“弘”殆影鈔殿本時，偶漏改而已，此下凡二本中改避清諱之字，如“弦”之作“絃”，“寧”之作“寧”或“寧”，“淳”之作“淳”等皆不復爲注出。

(註二) 英華作“脩身”，下有小注云：“二字一作‘日晡使’”。

(註三) 英華於“智”下有小注云：“一作‘志’”。

(註四) 全唐文避孔子諱作“邱”。

(註五) 全唐文作“是”；蓋不必改而改者。

(註六) 全唐文誤改作“非”。

取配韋弦；刻心骨而不忘，傳諷誦而無斂。蓋語曰：“明鏡可以覽形，往古可以知今”；是用尋往哲之遺(註一)事，驗古人之得失；寄彼形言，存諸炯誠；列之座右，題其賦云。

吾嘗終日不食，三省吾身；覺昨非而今是，庶舍舊而謀新。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也者，賢愚定其美惡，位也者朝市總其名利；七情由其不等，百行以之咸異。儻無心以自謀，良局途其必蹕。何者？得不思失，雄獨忘雌；耽人爵以健羨，窮代路之險巇。是則平衡而登九折，直轡而踐三危；干戈生於肘腋，胡越起於藩籬。假使履獸尾而不啞，探龍領以獲奇；省僥倖以適願，非仁者之所爲也。借如幽室鑿坯，窮居負郭，二頃樵採，一廛耕穫；名困汙(註二)於抱關，志充黜於懸箔(註三)。俄拔跡於羊豕，倏搏飛於燕雀。金紫照其陸離，銀黃煥其沃若。彼滿盈之難守，伊榮茂之易落：朝結駟而乘軒，暮齒劍而膏鏃。方思上蔡之犬，追念華亭之鶴。奚一身而足怪，迺九族其惟索。爾其寂寞(註四)無事，殷憂不平；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註五)而名不成。懷書訪道，學古言兵；擅雲間之美譽，馳日下之休聲。夫鐸穴(註六)由於足響，膏燭起於多明。趙國從而蘇裂，齊城下而酈烹。吹律誅(註七)於西漢，獻寶別於南荆，逐(註八)懷沙於楚塞，囚(註九)說難於秦庭。李仕登朝而就戮，嵇(註十)道超代而逢刑。苟才智之爲

(註一) “遺”字，全唐文所加。

(註二) 三本皆作“困沉名”。因其與下句不偶，我爲改作“名困汙”。司馬遷(元前135—約87)史記(130卷，裴駰[約427]集解，司馬貞[約719]索隱；張守節[736]正義；1894上海同文書局形印殿本)86.9a“嚴政傳”，“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

(註三) 英華作“懸箔”，既無義，復不韻。賦彙全唐文作“懸箔”，是。南華真經(10卷，郭象(312卒)注，陸德明音義[583]；四部叢刊本)7.6b“達生篇”，“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箔”爲“簿”之俗字。參王叔岷莊子校釋(5卷，1944；補遺，續補遺，附錄，共76葉，1945；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26，1947)3.27b

(註四) 英華賦彙作“莫”。英華加注云：“疑作‘寞’”。

(註五) 因唐太宗(627—649)之諱(世民)，疑劉知幾，當避改“世”字作“代”，如上文之“窮代路之險巇”；抑當減筆寫之，如倫敦大英博物館藏Stein 2717 珠英學士集敦煌殘卷所載劉知幾詩三首中，“處世”“隨世”等詞中之“世”字，皆減筆作“也”。宋人編文苑英華時，自不復遵避唐諱；故或改從原字。又上文“履獸尾而不啞”，不用“虎尾”，亦因其避唐高祖(618—626)祖，廟號太祖者之諱(虎)。

(註六) 英華作“穴”，似誤。鐸足響而穴；爲義甚佳。惜不知其有何典據。

(註七) 英華於“誅”字下有注云：“一作‘殊’。謂京房”。

(註八) 英華賦彙皆誤作“遂”。

(註九) 英華賦彙皆誤作“囚”。

(註十) 英華誤作“嵇”。

患，雖語默而同傾。若乃猛將出師，謀臣獻策；鱗翼攀附，風雲感激。開黃閣與朱門，樹高幡及長戟，恃龍蛇之恩舊(註一)，望鳥兔之盡獲。思擅寵於邦家，誓傳名於竹帛。蜀既平而艾檻，吳已霸而肯溺。黜淮陰以斃韓，遷杜郵而死白。彼功成而不退，俄寵謝而招隙。何追憶於布衣，翻興(註二)思於下澤。各入門而自媚，徒用閭其何益！亦有爵非才舉，榮因寵遷：吮癰求愛，舐痔逢憐；朝承恩而袖斷，夜託夢而衣穿。嗤弦直之死道，喜邪徑之敗田。氣噓霜而吸露，力轉日而迴天。自謂方江湖而共永，比嵩岱而齊堅。一朝失據，萬古淒然：至於申侯逼迫而辭楚，盧綰披猖以去燕。彼丁傳(註三)之崇貴，將梅茹之威權；疇一姓其或在，覆五宗而不全。次有跡鄙衡門，情娛俠窟；出入田寶，往來平勃；歌“無魚”以自媒(註四)，獻文蛇而請謁。疑臥薪之可久，謂巢葦之恆安。烈火照其潛燼，衝(註五)風歛其上棟。曹門傾而天鄧，賈室壞而夷潘；班坐刑於黨寶，殷取戮於臣桓；顧噉膺而不及，知觸藩(註六)之爲難。夫化赤漸乎鄰丹，爲黔資於邇墨。生於麻者，既革其操，染於藍者，亦變其色。交非鮑叔，遊異田蘇；忘臭肆之不惡，持甘醴以爲娛。餘推誠而狎(註七)耳，蕭結契而連朱：始勿頸以交約，終反噬而相屠。王綢繆於魏諷，石嫌疑(註八)於州吁，孫秀與趙倫齊貴，石顯將牢梁並驅：汙無禮以自及，蹈不義而同誅。別有直若史魚，正如伯厚；飾智驚物，露才不偶；持瑾瑜而指瑕，鑒冰(註九)鏡而求垢。彼獨潔之爲難，固羣醉之所醜。況乃誹謗朝廷，擠斥朋友；方縉(註一〇)紳以豚犢，延冠蓋以雞狗。符(註一一)結怨於晉臺，彭

(註一) 全唐文改作“舊恩”；似反不佳。下句，“盡獲”指鳥盡兔獲，二字並行；不宜以“舊恩”二字偶之。

(註二) 英華無“興”字。賦集全唐文加之，俾與上句相隅。

(註三) 英華作“丁傳”，誤。“丁傳”舊態，自求凶害見班固(32—92)漢書(100卷，顏師古[581—645]注；1894上海同文書局影印版) 100B.24a“外戚傳敘”。

(註四) 英華誤作“謀”。

(註五) 英華誤作“衝”。

(註六) 英華於“藩”字下有注云：“一作‘捨’”。

(註七) 英華作“狎”，下有注云：“一作‘狎’”。

(註八) 英華於“嫌疑”下有注云：“一作‘嫌疑’”。

(註九) 英華誤作“水”。

(註一〇) 全唐文作“搢”。

(註一一) 案符朗(約389死)於晉書(130卷，649；1894上海同文書局影印版) 114.30b—32a作符朗。然劉子史通通(20卷，710初稿成；1577張之象刻本) 8.1a“摸擬篇”亦作符朗。浦起龍史通通釋(20卷，1752；1894上海積山書局影印原刻本) 11.31b“古今正史篇”曾辨前秦之姓或當爲符。

肆言於蜀后，彌悲號於座上，庾譎譎於行後；揆榮辱之在身，猶樞機之發口；儻一言其靡愼，奚四大之能守？然則禮無微而不警（註一），怨無小而不讎。察關張之同敗，審韋弦之所由。豈直君子不可罔，而小人獨可仇？倜儻英時，昂藏遠邁；觀斯隸其如萍，觀輿臺其若芥；本無猜於螻蟻，寧有忌於蜂螫？安知驚炙輟授，七尺由其喪亡（註二）；羊羹匪均，三軍以之覆敗？苟有怨其必復，諒無所而不誠。於是考茲出處，稽彼行藏；咸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惑多言之必敗，迷暴貴之不祥。彼有足而罕衛，行立身而靡防；猶乘車之去軌，若涉海之無航。既百慮而一致，故異術而同喪。惟夫明達高人，賢良志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強死。無爲福先，無爲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爲而不恃。潔其心而穢其迹，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閭室而整冠，循覆車而易軌。以道德爲介冑，忠貞爲劔履。愛髮膚而不傷，保家室以不恥。若乃詢木厲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字慎以全榮，二疏既滿而辭仕；袁不及於愛憎，柳忘情於愠喜，漢先主之立誠，莫尚中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爲君子；余（註三）雖不佞，嘗從事於斯矣。重曰：夫含靈稟質，異品殊倫，生何如而弗貴，命何如而弗珍？鴈含枚（註四）以避繳，狐聽冰而涉津；葵傾心以衛足，櫟不才而謝斤。彼草樹之無識，惟禽獸之不仁，猶稱能以遠害，尙假智以全真。矧百行之君子，廼三才之令人，何自輕於養性，何自忽於周身？儻狂歌之可採，伊與誦之可詢，敢刊銘以勒座，遂援翰而書紳。

韋弦賦（以“君子佩之，用規性情”爲韻）

趙魏君子，跡著明文；有韋弦之淑愼，在躁靜以區分。於以誠德在我，於以表正事君。稟剛以宣其志，守柔以播其勳（註五）。動靜有恆，得樞機於要道；佩服無數，合規矩於典墳。昔董安于事趙簡子，虛心固節，收目反視。由一國之具瞻，在四德之爲美。誠孜孜於不怠，諒勤勤於所履。觀其弦之勁姿，可以勵其攸止（註六）。式標其道，於焉克己。所謂惕禍以垂休，故以善終而令始，且其（註七）

（註一）英華作“驚”，下有注云：“疑作‘警’”。

（註二）英華作“全”。

（註三）全唐文誤作“金”。

（註四）英華於“枚”字下有注云：“一作‘枚’”。

（註五）英華於“勳”字下有注云：“一作‘勳’”。

（註六）我懷疑“攸止”二字之上，或脫漏“節之”二字。

（註七）我疑“其”字或當作“夫”。

天道何常，順之無悔。察是非之倚伏，節行藏於進退。守而取則，在剛柔以爲箴；動必可觀，比玉劔之爲佩。鄴令乃曰：躁用乖於正性，故安卑以從時，靜既恭於五德，故不暴以爲師。命韋帶之閒綏，體君子之舒遲。惟器可象，惟賢則之。佩蘭則殊於楚客，象環有慕於宣尼。信建物之表志，實善人之所資。故知欲不可縱，儉以足用。德或可移，中以成規。識君子之容止，見淑人之表儀。周旋之中，寧假於宮徵；內外相制，亦合乎埴範^(註一)。大哉景行！剛柔異性。綏之於韋^(註二)用和，急之於弦表正，既守道而恆佩，因履端而不競。懿夫！式彰茂德，分意^(註三)表情。禮節既備，敬慎孔明。參衣冠而振^(註四)序，列簪紱以齊榮。猗二子之垂誠，與千古之揚名。

京兆試：慎所好賦（以“重譯獻琛，信非寶也”爲韻）

君子嚴其墻仞，戒以心胸；知耽味之易入，俾回邪而^(註五)不容，其慎德也，“白圭”是聞其三復；其好賢也，緇衣必薦其^(註六)九重。自然契已坦蕩，清心肅雍。玩喪志而何有，欲敗度兮何從！昔如王者三朝，遠人重譯；執贄山委，獻琛雲積。豈不知，納寶庫，爲子孫之藏，映玉墀，嘉戎夷之績？蓋以難得之貨有損，不貪之寶無散。獲狼而荒服不臻，却馬而漢皇^(註七)受益。嗤虞公^(註八)愛玉之敗，美晉帝焚裘之迹。匪騁欲而適願，將去奢而無怨。滿堂足戒，黃金寧慎其四知；連城不求，白璧何勞於三獻？所愛者禮，所懷者仁；君由之而父^(註九)國，士用之以防身。衣服有常，非敢玩於千襲；飲食不濫^(註一〇)，寧專美於八珍？其愛^(註一一)才也，必擇能而得儒^(註一二)；其慕友也，亦資忠而履信。將辭直而不

(註一) 全唐文作“埴範”。“埴”“範”可通用；“露”字誤。

(註二) 英華作“帶”。

(註三) 英華作“章”，下有注云：“一作‘意’”。

(註四) 英華作“振”，下有注云：“一作‘振’”。

(註五) 我疑“而”字當作“以”。

(註六) 我疑“其”字當作“於”。

(註七) 英華賦彙作“王”。

(註八) 英華賦彙作“受”。英華加注云：“一作‘愛’”。

(註九) 英華誤作“父”。

(註一〇) 英華賦彙作“濫”。英華加注云：“一作‘濫’。禮記：‘其飲食不濫’”。

(註一一) 英華賦彙作“受”。英華加注云：“一作‘愛’”。

(註一二) 全唐文誤作“儒”。

遠，知言甘而有吝，是窒其欲，無忽於微。五色足耽，審之則朱紫不奪；八音可樂，慢之則鄭雅同歸。思禁邪而制放，慮今是而昨非。上則宣風，下同（註一）偃草。將還淳而復朴（註二），在耽德而味道。蒐田失度，則念“虞人之箴”；慈儉或虧，必思老氏之寶。至矣哉！好之者，儒以多聞爲潤屋，立義爲分社。孝既慕於參乎，學願從於回也。孜孜屑屑，東脩（註三）問寡。如此，人所以銘座而弗忘，書紳而不捨（註四）。

若就書籍之近世傳本而論，這三賦的來源，似乎皆出於文苑英華卷九十二。英華於“思慎賦”題下有撰者姓名“劉知幾”三字；其於序前別有識語一段云：

國史曰：知幾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志。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之，相顧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註五）及也；當今防身要道盡在此矣”。

從這一段來看，可見當李昉等編輯文苑英華之時，劉子玄集，無論其爲三十卷抑十卷本，都已不存（註六），而“思慎賦”的來源乃出於唐人所編總集文史等類之書籍。其曰知幾，不云子玄，可見劉撰賦時當在景雲（710—712）以前。賦序云“余早遊墳素，晚仕流俗”；可見知幾當時正在做官。舊唐書“劉子玄傳”謂在武后證聖年（695）知幾爲獲嘉主簿表陳四事之時。然序中有“觀止足於居常”句，而武后於載初年（690）改唐爲周立武氏七廟時，已追尊其高祖居常爲肅祖章敬皇帝（註七）。賦序既不避武周廟諱，

（註一）英華於“同”字下有注云：“一作‘如’”。

（註二）賦彙全唐文作“僕”。

（註三）賦彙全唐文作“修”。

（註四）賦彙全唐文作“舍”。

（註五）英華脫“不”字。我從舊唐書102.6a及冊府元龜（1000卷，1013；1612黃國琦刻，1672黃九錫1757丁序賢補刻本）840.14a所引補之。

（註六）舊唐書47.41b“經籍志”載劉子玄集十卷；唐書60.11b“藝文志”作“三十卷”。日本國見存書目錄（藤原佐世〔898卒〕編；續群書類從卷884），崇文總目（66卷，1042；錢侗等輯5卷，1799；後知不足齋叢書本），文獻通考（馬端臨編348卷，約1319；十通本2764頁）1051—1967“經籍考”，宋史（496卷，1345；1894上海同文書局影印殿本）卷202—209“藝文志”都不載其書。

（註七）見唐書4.3a，6b—7a，9a，“則天順聖武皇后紀”；資治通鑑（司馬光撰294卷，1085；胡三省注，1285；1927上海大中書局影印胡克家刻本）203.6a；204.5b，9b。舊唐書183.8b“武承嗣傳”於武氏祖先世次名諱有誤；參林寶元和姓纂（10卷，812；洪鑾輯，1802；1880金陵書局刻）6.18b，唐書74A.28a“宰相世系表”，沈炳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補（12卷，1733；二十五史補編7575—7592）7588，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記（11卷共，126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26，1948）587。

其撰時當然必在載初以前(註一)。

然文苑英華雖於“思慎賦”題下明著劉知幾之名，而其後所接連登載之“韋弦賦”及“京兆試：慎所好賦”則於題下皆未標撰人姓氏。若三賦皆為劉氏一人所作，則三篇之先後排列大有失次之嫌。蓋子玄卒於開元九年(721)(註二)，卒時年六十一(註三)，則當生於顯慶六年(661)。史通“自敘篇”云“年登弱冠，射策登朝”，則其省試及第當在永隆元年(680)(註四)。登第在先，入仕在後，則“思慎賦”必作於永隆元年以後。如其曾應試京兆而作“慎所好賦”，則府解在先，省試在後，入仕更在後，而“思慎賦”之作當在“慎所好賦”之後。既同為一人之作，同居一類之文，何為而置其早者於後？想雍熙(984—987)間編纂英華之翰苑諸公當不至憤憤如此。

案文苑英華編纂之例，凡文數篇同出一人，則首篇題下載撰人之名，餘篇題下只著“前人”二字。然則，凡題下未載撰人者當是不知誰何所作之篇。是以賦彙轉載“韋弦賦”及“慎所好賦”二篇皆於題下標云“(唐)闕名”。全唐文之編輯在賦彙之後一百餘年；總纂官徐松本是考據能手，其於英華本中題與撰人之誤亦間有考證(註五)，不知其為何故竟把二賦撥歸劉子玄名下。其“凡例”曾云：“原書編載文苑英華諸文，所據係明刊閩本。其中譌脫極多。今以影宋鈔逐篇訂正，補出脫字。又以元祝堯古賦辨體

(註一) “國史”所云蘇味道李嶠見賦之時，自不必即在劉知幾作賦之年。如唐書61.18b—19b“宰相表”為可據，則聖曆元年九月辛巳 (2.xi, 698) 蘇味道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十月癸卯 (24.xi, 698) 李嶠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三年三月辛未 (15.iv, 700) 嶠守鸞臺侍郎兼修國史，蘇李二人同為鳳閣侍郎之時乃在聖曆元年至三年之間。但據舊唐書6.11a，唐書4.16a，通鑑206.9a，則聖曆元年十月癸卯李嶠乃以麟臺少監（通鑑用武周之前及其後之通稱：秘書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不知嶠當時是否以知鳳閣侍郎改麟臺少監，抑以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參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1091頁，書目2頁，引得30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36，1956）102，555。

(註二) 見通鑑212.6b。

(註三) 見舊唐書102.11b，唐書132.4a。

(註四) 史通10.15b。案徐松登科記考（30卷，1838，南菁書院叢書）2.27a載劉知幾進士及第於永淳元年（682），加注云：“…舊書…弱冠舉進士。按子元卒在開元九年，年六十一。開元元年〔681〕年二十。唯其年進士一人，故載是耳”。徐氏計劉弱冠，誤後一年。然其置劉登第之年於永淳元年（劉年二十二），實未可厚非。蓋“年登弱冠，射策登朝”八字之中兩見“登”字，頗足為嫌。如原是“年方弱冠”，則永隆元年亦祇進士一人（登科記考2.24b）。如原作“年逾弱冠”，則永淳元年頗足以當之。

(註五) 如文苑英華397.5b載孫逖“授武三思鴻臚卿制”。全唐文962.2b考云：“逖知制在開元二十四年；時三思久誅。新舊書亦不載三思官鴻臚卿。題與撰人，必有一誤。今存疑，編入‘闕名’”。參勞格（1820—1864）讀書雜誌（12卷；月河精舍叢鈔）6.19b。

(註一) 補出諸賦撰人姓名”。可惜我如今未得檢查古賦辨體，不知徐氏於二賦撰人之誤是否沿襲祝氏而來。

無論如何，除了上邊所舉闕名失次二端而外，我們尚有別的理由可證二賦之不出於劉知幾。一、試將二賦之文與“思慎賦”相比，立即可覺其氣味大不相同。“思慎”如何穿穴史傳，品藻人倫；如何風發泉流，奔馳朗暢！二賦如何循題蹈韻，索意求辭；如何蹢躅短垣，庸音足曲而已！能作二賦者，將不能作“思慎”。能作“思慎”者，必不肯作二賦。

一、劉知幾父名藏器。“思慎賦”中無“器”字。史通二十卷亦統無“器”字。“韋弦賦”中有“惟器可象”句。若使知幾作其賦，那可不避家諱？

一、知幾彭城人。其欲舉進士當由徐州貢解。何爲應試京兆？

一、雍州改名京兆，據舊唐書“天授元年改雍州爲京兆郡，其年復舊。……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其後不復更改(註二)。若擬“京兆試：慎所好賦”之京兆爲天授元年之京兆郡，則天授元年僅得自九月壬午(16.xi、690)至十月壬申(5.xii、690)前後共五十一日而已，其時國號已改爲周，武氏已追尊七廟，賦中何得用“常”字於“衣服有常”之句？且其時劉知幾年已三十，早已射策登朝，服官入仕了。若說賦題上之京兆是起自開元元年(712)之京兆府，則開元元年劉子玄已年五十三，已官至太子左庶子崇文館學士了。

一、登科記考引永隆二年(681)八月詔“進士試雜文兩首”，加注云：“按雜文兩首謂箴銘論表之類。開元間始以賦居其一，或以詩居其一。亦有全用詩賦者，非定制也。雜文之專用詩賦，當在天寶(742—756)之季”(註三)。府試科目的範圍當不至於越出省試定制。然則劉知幾早年應試文中當不能有“慎所好賦”。況且“慎所好賦”題限“重譯獻琛，信非寶也”八字韻脚。登科記考於開元二年(713)“進士十七人”條下注云：“永樂大典‘賦’字韻注云：‘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始有八字韻脚。是年試“旗賦”

(註一) 四庫全書總目 (200卷，1773至約1790；1930上海大東書局影印本) 188.3b有祝堯 (1318進士) 古賦辨體 8卷，外集2卷。

(註二) 舊唐書 38.10b “地理志”。

(註三) 登科記考 2.25b—26a。所引永隆二年詔，見唐會要 (100卷，961；武英殿聚珍版書) 75.28a—b，冊府元龜 639.19a—20a，唐人詔令集 (130〔佚23〕卷，1070；適園叢書本) 106.18a—b。

以“風日雲野，軍國清肅”爲韻。按雜文之用賦，初無定韻。用八韻自此年始。見能改齋漫錄引偽蜀馮鑑文體指要”(註一)。然則，劉知幾早年應試，不至於應京兆試，不至於作賦，更不至於作限韻八脚之賦矣。

徐松之編成全唐文在其撰成登科記考之前二十六年。想其當時尙未熟於唐代貢舉之掌故，尙未能一望京兆試賦限韻八脚之題而卽知其文之斷不出於劉知幾。然其誤將二賦歸於劉氏，實遠不如陳元龍於賦彙中之標出“闕名”。在昔勞格有“讀全唐文札記”(註二)，近年岑仲勉先生復有“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註三)惜皆未及糾正徐氏此端之誤。劉漢先生之“劉子玄年譜”及傅振倫先生之劉知幾年譜又復都以二賦爲劉氏所撰(註四)。恐更貽誤學者，故不可不辨。

(註一) 登科記考 5.17a。“王邱”於永樂大典中及於今並當作王丘；參唐僕尚丞郎表引得頁2。徐能改齋漫錄(吳曾〔約1133〕著16卷；守山閣叢書本) 2.8b。

(註二) 見讀書雜誌 8.1a—19b。

(註三) 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9 (1947) 239—370。

(註四) 劉漢“劉子玄年譜”，努力年報 1 (1929) 75—95，94。傅振倫劉知幾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68，160。

康熙幾暇格物編的法文節譯本

陳 受 頤

(一) 十八世紀關於中國的三部法文鉅著

十八世紀是近代中西文化溝通初期的由極盛而轉入衰落的時代，又是由歐洲好幾國的教士共同參加而變為法國教士逐漸包辦的時代。當時蟬聯而出的三種大規模的有關中國的歐洲刊物，都是用法文寫定印行然後轉譯為他種歐洲文字的。第一種是一七三五年在巴黎出版的杜赫德主編的四大厚冊對開本的中國通志（註一）。第二種是期刊性的耶穌會士通信集，一七〇二年巴黎耶穌會的總書記雷果辦創辦主編，其後繼續出版，到一七七六年停刊的時候，一共出了三十四冊。此書所刊佈的教士通訊，雖然包涵着關於南北美洲和印度近東的報導，主要的材料却毫無問題地是入華教士寄發的那一部份（註二）。第三種是一七七六至一八一四年間陸續刊行的中國叢刊，一共出了厚厚的十六冊（註三）。當時有關中國的著述雖然很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三厚冊的

（註一）編者的姓名原文是 Jean Baptiste Du Halde 方杰人（豪）教授譯為杜赫德（中西交通史第五冊一八五頁），今從之。王國維舊譯為特赫爾特（王忠愍公遺書丁卯排印本四集宋元戲曲考八頁）。戲曲考又云：「至我國戲曲之譯為外國文字也，為時頗早。如趙氏孤兒，則法人特赫爾特實譯於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而麥利安又重譯之。」這句話不全對。趙氏孤兒的譯者是馬約瑟 Joseph-Henry-Marie de Prémare 神甫，譯文在中國通志的第三冊三三九至三七八頁，一七三五年刊行。中國通志的原文名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Tartarie Chinoise。

（註二）第一集刊行於一七〇二年，到一七〇三年改稱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 E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編輯人是（一）一七〇二至一七〇八出版的前集和一至八集——Charles Le Gobien (1653-1708)；（二）一七一一至一七四三出版的第九集至第二十四集——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94-1743)；（三）一七四九至一七七六出版的第二十五集至最末了的第三十四集——Louis Patouillet (1699-1779)。三位都是耶穌會士，都沒有到過中國。第三位——帕都華神甫——是服爾德在文章裏常常諷刺的。

（註三）原文的標題是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e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e-kin 就是說「北京教士所寫的關於中國人的歷史、科學、藝術和風俗習慣的割記叢刊」。書背簡稱 Mémoires des Chinois 故翻為「中國叢刊」。

馮秉正的法譯通鑑綱目和他自著的續編(註一)——但是流通之廣，影響之大，都不能和這三部書相提並論，無怪日本的後藤末雄教授稱之為歐洲十八世紀有關中國的三大名著了(註二)。

這「三大名著」不特編輯的體例各自不同，就是材料的性質，也並不一致。中國通志是杜赫德神父根據積聚了一百多年的入華耶穌會士的各種著述和通訊，經過相當長期的消化，小心的選擇，系統的編排，一手鑄成的綜合式的著述。耶穌會士通訊集可以說是「原史料」的期刊，雖然有主編的人，並不見有很多「刪訂」的痕迹。牠的缺點是內容龐雜，關於佈教的記載，又有許多侈陳靈異的地方；牠的長處是未經洗鍊，書簡的原來面目差不多全部保存，有時瑣屑囉嗦的地方，特別有趣。關於中國的部份，尤其受當時讀者的歡迎，因為裏面有不斷的新鮮而生活的材料。

可是，在通訊集刊行的七十四年之間——由一七〇二至一七七六年——新舊世界都已經過了不少的重要的轉變了，我們在此不必細說。就是整個耶穌會的地位，尤其是會士在中國一方的地位和他們的溝通中西文化的工作和影響，也早已受到了極大的動搖了。西歐的幾個天主教國家，相率運用政治的壓力，在短短的十一年裏竟把一個國際性的龐大的組織完全消滅了。首先在一七六二年巴黎議會通過了一個抨擊耶穌會的議案，說他們「淪衣冠於禽獸，變教友為邪徒」(註三)。一七六七年西班牙下令驅逐耶穌會士。兩年之後，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那波里四國更聯合要教廷解散該會。一七七三年教宗克肋孟十四，便愛莫能助的接受四國要求，下解散耶穌會的明令了。

在此情形之下，耶穌會士通訊集是無法繼續刊行的了，最後出版的四集——都在一七七三年之後——只能看作結束刊物的尾聲。然而會的組織雖被解散，傳教事業雖然委託了其他的宗教機關接收，可是入華的耶穌會士，仍然繼續在中國居留。更重

(註一) 馮秉正 Joseph-Ann-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 的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es du Tong-Kien-Kang-Mou 寫定於一七三七年，刊行於一七七七至一七八五年，共十三厚冊。

(註二) 支那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東京第一書房昭和八年版)頁一九五。

(註三) 見 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 著的 *l'Épopée des Jésuites française en Chine* (Paris, 1927) 頁二二三以下引。議案的序言對耶穌會士為無惡不作。本文意譯的句子是“ils enseignent aux hommes à vivre comme des bêtes, et aux chrétiens, à vivre en païens。”

要的是，他們的中國研究的工作，仍然受西方智識界的注意。改裝易服地繼承着會士通訊集的工作的便是中國叢刊。叢刊的初集跟通訊集的最後一冊，同在一七七六年出版，單從這一點看來，已經可以透露兩種刊物薪火相傳的消息了。

然而從另一角度看來，我們又不能不說叢刊到底是「另起爐灶」的新刊物。(一)耶穌會的解散是波及西歐思想界的傳教史裏的一件劃時代的重大事情，主要的導火線恰巧又是所謂「中國典禮」問題的長期的爭辯。爲了忌諱的緣故，「耶穌會」，「耶穌會士」，「中國典禮」，這些字眼，都不大重提了。叢刊扉頁說到材料的來源，也只好隱約其辭的說「北京教士」。發刊詞裏所特筆大書的兩個留法十五六年的中國學生高類思和楊德望，原是北京耶穌會士保送，後來在巴黎又躬親入會的經過，也只好曲筆拖過，諱莫如深了。(二)中國叢刊每期登載學術性的專著或翻譯文章三五種或多至十種八種，體材和內容，都與通訊集異趣(註一)。而且先後主編的三個人，都是以學者的資格受政府的資助與委託的：勃羅提業雖曾當過耶穌會士，他的專業是希伯來，希臘和羅馬古代錢幣的研究；老德經是法國王家學院的敘利亞文教授，曾著匈奴族突厥族與蒙古通史；薩西精通十幾種歐洲和近東的古今語言，尤長於波斯和亞拉伯學，是近代比較文法學的先導者之一，又是後來(一八二二)法國亞洲學會的發起人之一(註二)。

叢刊的成立，可以說是法國初期系統「漢學」的先驅了。

(二) 中國叢刊在十八世紀歐洲的地位

上面寫的冗長引論，殊有頭重體輕之感，可是中國叢刊的歷史地位和刊印的經過，似乎還未受過國人相當的注意。例如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中法漢學研究所在北平鄭重舉行之「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之法國漢學」圖書展覽會中，編號第十二項即爲此刊。展覽會書目著錄的出版年月爲一七七六至一八一四年，與我們前段所說的原刊本完全符合；可是同書目(頁十四)所影印的叢刊第一期的標題頁，却明明白白的說是「共和

(註一) 日本石田幹之助教授著的歐人之支那研究頁二一三——二一八有每期目錄的詳細譯文，可參看。法國高狄爾(Henri Cordier)的中國書志(Bibliotheca Sinica)五四——五五欄有原文的細目。第十一期包含文章篇數二十多篇，可以說是例外。

(註二) 三人姓名的原文是 Gabriel Brotier, 1723-89; Joseph de Guignes, 1721-1810; Antoine Isaac Sylvestre de Sacy, 1758-1838。老德經者，所以別於他的兒子小德經 Chré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 也。

五年」——即公元一七九七，證明這是很罕見的巴黎重印本，連最為精心結集的高狄爾的中國書錄的正編補遺和續編都沒有著錄過的，而展覽書目的說明部份，竟然沒有按語。無怪「緒言」中全不提到叢刊的特性，和他在歐洲知識發達史上的地位了（註一）。

發軔於還未統一的德國而大成於法國的所謂「啓明運動」，包涵十八世紀歐洲學術史的兩種共同趨勢：範圍的擴張與比較的方法。用一句話總括起來，便是新材料的尋求與運用。所以中國叢刊，比起其他的有關中國的刊物，可以說是更為適應時代的要求的。

叢刊的搜集材料的工作，雖然靠着居留中國的已被解散的耶穌會士，大體說來，已不是佈教工作的產物而是學術性的論著了。

叢刊除了學術論著之外，常常還有譯文。例如第一期有大學和中庸的法文新譯本，第二期有司馬光的一首園庭詩（註二），第四期有康熙幾暇格物編。第四期以下，專著漸多，翻譯漸少，然而第十三期裏面，還有幾首中國詩的譯文。這些翻譯的文章，雖然都排近卷末，可不是隨便搜集來填塞篇幅的。大學和中庸，誠然是自從利瑪竇到中國之後，便經過不知多少回的歐譯的了（註三）。這回重譯的原因——暫且不提譯筆的好壞——大抵是因為幾本拉丁文的舊譯既不通俗，他們的轉手法譯本又多了一層間隔，而且都是早期刊出，免不了與所謂典禮問題的教爭，有多少的關係，倒不如重新直譯，可以省去了種種的誤會與麻煩（註四）。園庭詩的翻譯，是因為當時所謂中國式的花園，早已成為時尚，這種材料，最受讀者的歡迎。詩的翻譯，也響應了在萌芽的文學上的浪漫主義的趨勢——搜求遠古和遠方的韻文的熱鬧。幾暇格物編的翻譯，正如叢刊裏的好些偏向科學的文章，正合當時「百科全書」運動的格致派的口味，更不待言了。

（註一）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之法國漢學頁十四、十五。我從前疑心「共和五年」本是原刊本的化身，只換了新的標題頁，後來才覺得證據不足，至今還未敢斷定。

（註二）我曾翻看四部叢刊新印宋紹興本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兩回，都沒有找出所謂園庭詩的原文，誌此待考。

（註三）利瑪竇曾翻譯四書，現在雖然未曾找到手稿，可是在他的全集的已刊的部份，到處可找證據。參看中國書誌第三七九欄。

（註四）中國書誌一三八六——四〇三欄，又三七九四——三七九六欄。支那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頁二一九——二二六有三種譯文的比較。

(三) 幾暇格物編的譯者——韓國英神甫的著者的因緣

康熙幾暇格物編的譯者是法國教士 Pierre-Martial Cibet 神甫。他的中國姓名是韓國英，字伯督。公元一七二七年生於法國中部的里摩日 Limoges 城，一七八〇年卒於北京。十六歲入耶穌會，專治人文科學，以勤學著稱。畢業後請求該會派遣到中國去。一七五九年到中國，一七六〇年(乾隆二十五年)移居北京。他在中國繼續居住的二十一年零兩個月，差不多全部在北京度過(註一)。

韓國英的基本訓練，雖然是人文科學，他對於當時的所謂格致之學也是有相當的修養的。據他自己的通信所記載，他曾花了四五年的工夫供奉內廷，做佈置水景，修理鐘表和其他的法條機器的零碎工作。甚至「中國的凡爾賽」的栽花種樹，他也參加。他對於植物學的興趣和知識，後來給他不少的著述的資料。

說到著述的分量，他的地位在同輩的會士中，是特出的，只有錢德明(字若瑟，一七一八——一七九三)一人比他優越(註二)。中國叢刊的文章，多由他們兩人執筆，不是偶然的。錢德明在叢刊的最初三期裏面，除了翻譯大學，中庸，和司馬光的園庭詩之外，還做了九篇文章，大多數是關於植物的長篇劄記，最長的一篇是論中國的選占。到了第四期，則竟然整本都是他的譯著了！

康熙幾暇格物編的譯文，就是在第四期(一七七九年)發表的。

韓國英爲甚麼要挑選幾暇格物編來翻譯呢？除了上面說過的適應當時法國——甚至歐洲——的知識口味之外，大抵還有旁的理由。清聖祖是初期耶穌會士所最佩服最稱譽的中國君主。從宗教上看來，他是耶穌會士的庇護人，不特平反了由楊光先事件而受處分的教士教徒的冤獄，而且拔用南懷仁以次的教士於欽天監。後來「典禮問題」變爲天主教的內鬩時，他又始終支持耶穌會士閔明我、徐日昇、安多、張誠等對於祭

(註一) 費類之神甫著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a* (上海一九三四年刊)卷二頁八九〇至九〇二。此書共收會士傳記五百六十七篇，卷一的最初的五十篇，有馮承鈞譯本，改題入華耶穌會士列傳(民國二十七年商務印書館刊行)。韓國英的傳，是四百一十篇，故未譯出。

(註二) 錢德明神甫的法文名字是 Jean-Joseph-Marie Amiot，他的傳記和著述表見華耶穌會士列傳原文本第二冊頁八三七至八六〇。